

← (上接14版)

馆地,而阅馆书,书为主而我为客,无异寄生于书。”

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,叶景葵病逝。好友张元济饱含深情作诗云:“万卷输将尽,豪情亦罕闻。君能成众志,天未丧斯文。”

## 蒋抑卮与凡将草堂

当叶景葵倡导并筹建合众图书馆之际,他的事业“黄金拍档”、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自然不会作壁上观,他当即捐出明庶农业公司股票5万元作为图书馆购书基金,又率先捐书34000余册。蒋抑卮表示:“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,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,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,终是要靠着互相通假的。”

蒋家善于经商,名头赫赫,独占杭州丝绸业的半壁江山。蒋抑卮(字一枝)自幼好学不倦,曾随章太炎学习文字、音韵和训诂,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,专攻政治经济,初通金融之道。回国后,蒋抑卮躬身参与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筹划与创立,之后接替父亲成为该行董事。经营管理银行之余,蒋抑卮尤好读书藏书,茶余饭后手不释卷,与同仁以道德学问互相砥砺,形成了一种处事严谨沉稳的作风。

1918年,蒋抑卮联手“银行业大咖”李馥荪、张嘉璈、钱新之等合资买下沪西宅地70余亩,兴建别墅区,取名“范园”。蒋家为园中大户,独占644号、646号两幢别墅,蒋抑卮在自家别墅后面建一幢三层楼的藏书楼,以汉代司马相如文字学著作《凡将篇》为自励,得名“凡将草堂”,将多年来千辛万苦购入的图书珍藏于内,达15万卷以上。其中以购得苏州汪柳门万宜楼藏书为基础,陆续增添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典籍,特别是收藏了江南一些名门望族的族谱共526卷451册,以明成化和万历年间的抄本或刊本最为珍贵。

除了对合众图书馆鼎力相助,蒋抑卮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,是与鲁迅先生的一段书缘。1909年2月,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翻译出版《域外小说集》,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,此举得到了绍兴老乡蒋抑卮的支持,慨然垫出一笔印刷费。周作人《知堂回忆录》有一篇文章题为《蒋抑卮》,对此记述:“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,就大为赞成,愿意垫出

资本来,助成这件事,于是《域外小说集》的计划,便骤然于几日内决定了。”初集印了1000册,二集印了500册,由于销售不佳,卖剩的书籍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凡将草堂藏书楼。对蒋抑卮的这一义举,鲁迅一直心存感激,两人鸿雁往来,联络不辍。有人盘点,从1912年到1928年,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。1936年鲁迅病重,蒋抑卮曾到大陆新村探望,兴奋地表示要为鲁迅办一个从事文学创作30周年纪念会。未料这一次见面竟成永别。追悼会那天,蒋抑卮送去了“文章千古”的挽幛,还找到许广平许诺要资助《鲁迅全集》的出版。

鲁迅年轻时爱给朋友起绰号。比如称文字学家钱玄同为“爬来爬去”,称日本留学的同学邵明之为“熊”,给蒋抑卮起的绰号,干脆就是一句绍兴闲话“拨伊铜钱”。原来,急公好义的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,凡是遇到危急难搞的事情,常说“拨伊铜钱”(即“给他钞票”的意思),充满了银行家的豪气、底气和义气。蒋抑卮“拨伊铜钱”之名不虚。他早年赞助的《浙江潮》,系上世纪初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,闻讯创刊当即掏出100元作为杂志的开办费;他以个人名义设立“凡将草堂小学基金”,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,并设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“以研究丝织为专务、著有信誉”的“本国人学术团体”,尽管这一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。

谨遵先父遗命,蒋抑卮的几个儿子也热心社会公益,1952年把凡将草堂留存的藏书200余箱1213种,全部捐赠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,如今绝大部分珍藏于上海图书馆。蒋抑卮生前在浙江兴业银行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,建国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。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,蒋氏后人拿出其中的3万元在浙江丝绸工学院(今浙江理工大学)设立“蒋抑卮丝绸奖学基金”,以奖掖优秀学子,振兴民族丝绸工业。

## 陶湘与涉园

津门众多的私人藏书家中,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陶湘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,他的藏书多达30万卷,集于自身,又散于自身。纵观其三十余载藏书生涯,正所谓聚也匆匆,散也匆匆。

陶湘(字兰泉)大半生从事

实业和金融业,在争逐利场之余暇,寄情于图书,自言“生平于缥緲外,无他嗜”,因而被称为商场俗世之雅人。1926年,他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、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,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,成为专门鉴定殿本书的专家。

天津的成都道、西安道、山西路合围的三角地,民国时期这里西式洋楼鳞次栉比,然而十年前却被拆成一片临时绿地,惟有一幢洋楼岿然独存,显得有些孤独和无奈。1922年“涉园”主人陶湘由北京迁居天津,便在这栋楼里展卷摩挲,藏书纂述,直至1934年移居上海。为收集宋版精品,陶湘不仅在京津两地书肆访求,而且还向南北方的书贾求购,一旦遇到孤本善本,不惜代价,一律收购珍藏,数年后其收藏宋版精品达40余种,均为罕见珍本。据傅增湘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》记载,陶湘涉园藏书总数多达30万卷。

与当下收藏圈崇尚“真、精、新”如出一辙,陶氏藏书亦有三个特点:一是品性真,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的大宗;二是品质精,嗜好毛氏汲古阁刻本、闵氏套印本、武英殿本、开化纸本等,所藏皆为海内一时之冠;三是品相新,藏书讲究完美无缺,尤其重视装帧精美,书籍入藏之前,他总要亲自检查整理,如稍有破损,必购旧纸,觅良工巧匠照原书法摹写补足,整旧如旧,还亲自设计月牙式四合书套,选工极严,被书林誉为“陶氏书套”。

丰富的藏书为陶湘校勘创造了条件,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因素。刻书不仅可以保存古籍,传承文化,还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。经他校勘的书籍,几乎红笔圈遍,用心剖析其中的疑义错谬;而经他刻印的古籍,校订优良,纸墨优美,行款装订均为佳妙,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。自1921年至1931年,涉园校勘、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。伦明在《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》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:“以类求书书不同,巧于弃取绍陶公,藏书岂若传书久,欲散家费养刻工。”陶湘由藏书转入刻书,足见其目光如炬,志向高远。

“读书难,藏书尤难,藏之久而不散,则难之难。”明清思想家黄宗羲道出了典籍聚散的甘苦。陶湘虽为银行家,却不善理财,寓于沪上后,夫人撒手人寰,家务无人照料,又专事刻印古籍,入不敷出,难以供养子女读大学,家境每况愈下。于是他开始出售藏书,同时继续刊刻古籍,以维持生计。涉园藏书,



叶玉森

海内外知名,大都争相购买,日本侵华后,陶湘不受利诱,拒绝与日伪合作。因刻书之业无后人继承,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藏书及书版交国家保存之夙愿,他在遗嘱中教育后人,不论有无回报,也应“公藏世守,万勿弃置”。陶湘临终前,珍藏大部分散去,而利债陆续还清,所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仿宋书板约40箱,寄存在天津交通银行保管箱库房里。新中国成立后,陶氏子女遵照父亲遗愿,将40箱藏书悉数捐献给国家,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,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涉园藏书的散佚,恰与时局动荡休戚相关,正如陶湘在《清代殿版书始末记》中所言:“国力之孱弱而文物相与以俱衰。”别具慧眼识典籍,无奈聚散两匆匆。在浩瀚藏书历史长河里,陶湘宛若一颗流星,30万卷典籍瞬间即逝,却在书界留下绚丽夺目的光耀。

## 叶玉森与五凤研斋

一个人,通晓中西文化,涉猎多门学术,洞悉世情百态,既攻诗词文赋,谙熟外文翻译,亦善书画篆刻,考释甲骨文字,还涉足音乐教学,解析代数几何微积分难题,如此多面手便是曾任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书长的叶玉森。

1880年,叶玉森(字菘渔)出生在江苏镇江九如巷,小小街巷人杰地灵,方圆一两里内,“盛产”文化名人,诸如“京江画派”代表人物张夕庵,《铁云藏龟》作者刘鹗,《马氏文通》作者马建忠,图书馆学大师、书法家柳诒徵,楹联学家赵曾望等等。叶玉森从小天资颖异,16岁考取秀才,29岁赴日本早稻田大学、明治大学攻读法律。叶氏多才多艺,担任音乐教员,编著《手风琴唱歌》一书,攻克数学难题,出版《筹尘》算稿一册,潜心文学创作,发表小说《阿娜恨史》《皇帝借债》《牛女怨》等,至于信手拈来的诗词楹联丹青治

印更是不计其数。甚为难得的是,他还翻译引进了不少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,且风骚、乐府各体兼备,如雪莱的《云之自质》用骚体翻译,邓尼生的《战死者之蠕与孤》用乐府诗翻译,朗费罗的《矢与歌》用汉魏乐府体翻译,引领当时诗坛风气之先。

宦海浮沉,仕途坎坷。回国后叶玉森混迹于家乡政界,先后担任议会议员、政府知事、法院推事兼检察庭长等职,郁郁不得志,卸任来到上海闯荡,在同乡好友、南社同道的扶助下,进入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任秘书长,谋一枝之栖。

叶玉森的五凤研斋,取自他收藏的“汉五凤二年砖砚”,极为珍稀,故而砖砚被叶氏视作书斋长物。跻身银行、案牍劳形之余,叶玉森埋首于五凤研斋,博览群书,潜心著述,特别在金文、甲骨文领域多有心得,朝夕摹写,对古文字的形体与笔法谙熟于心。他斥资购进甲骨1300片,研究其结体和章法,“以毛笔为刀笔”,致力于甲骨文的书法创作。他的篆书不拘于字形,从用笔到结体随意念而行,生动婉转,精致细腻,富有书卷气息。他还是“在印坛上用甲骨文刻章开先河者之一”,并撰写《说契》及《研契枝谭》各一卷,奠定了其在甲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。补白大王郑逸梅说:“海内擅甲骨文者,罗振玉外,当推丹徒叶菘渔(玉森)。”

天妒英才,叶玉森长期焚膏继晷,废寝忘食,“每于子夜深,揽卷一灯熏,……勒披眼欲昏,冥索脑乃热”,终于积劳成疾,得了肺气肿,在贫病交迫中溘然长往,享年54岁。叶玉森早年虽在家乡为官,但洁身自好,两袖清风,家无田产房产,又不善打理家政,一家老小及弟妹生活费用均由他负担,仅靠银行职员收入难以维持开支,以致债台高筑,辞世时家徒四壁,丧葬费只好由上海交通银行解决。

叶玉森生前完成的最重要著作《殷墟书契前编集释》,经上海中南银行总银文书主任兼总务课长秦更年、四行储蓄会襄理吴静庵等热心人士组成的“叶菘渔(玉森)遗著整理同仁会”的鼎力相助,于1934年10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面世。令人扼腕的是,其《殷墟书契后编集释》亦已脱稿,书稿却被佣人偷卖至扬州书肆,至今不知下落。叶氏五凤研斋遗书数万卷,被他的小儿媳称斤论两卖给了镇江图书馆。至今,镇江图书馆古籍部还收藏有他的数十种著作手稿,是国内收藏叶玉森文献最多的机构。■